

泰戈尔与许地山、冰心笔下的女性世界之比较

张 羽

(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所,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泰戈尔与许地山、冰心笔下的女性形象有着一定的类似性,她们大都处于生活的重压之下,信奉“生本不乐”的人生哲学,坚持行动主义。比较这些人物形象的相似性和相异性,可以分析中印两国民族的心理状态,促使文化交流深入展开。

[关键词]女神;女奴;无妻性;行动哲学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03)10-0162-02

在历史长河中,女性发展史经历了“女神”、“女奴”和“女人”等几个阶段,泰戈尔和许地山、冰心塑造出的类似的女性人物介于女神与女奴之间,她们在艰难的生命之路上,显示出独特的生命哲学。泰戈尔的文学作品进入中国时,正值五四时期,此时的文坛容易传播开来,其塑造的女性形象深受中国读者的喜爱,因此影响了许地山和冰心笔下的女性形象,成就了人物塑造中的泰戈尔式。

一、女人在道德上高于男人,是对男尊女卑古训的大胆反叛 泰戈尔笔下的女性人物多是经过理想化处理的形象,她们的本体性格是自尊、仁慈和坚韧。这与泰戈尔的妇女观有很大关系,他认为女子的功用是泥土的受动的功用,在这一意义上,他格外注重形象的真与美。在戏剧《齐德拉》中,齐德拉面对激烈的心理冲突,意识到只有素朴纯真、同甘共苦才是男女关系得以维系的关键。在小说《幻想》中,歌玛虽然失明了,但她的仁义善心受到很多人的尊敬,这让丈夫的所作所为显得更加渺小。泰戈尔还经常塑造那些被社会视为异己分子的人物,像流浪汉、寡妇、哑女、盲妇和疯子等女性人物,她们不断地处在命运的旋涡中,泰戈尔刻意描绘这些人物怎样进入现在不利的局面,善良的本性如何使她拥有处乱不惊的平静的生命状态。

许地山将泰戈尔看做“知音长者”,二人都是宣传爱与美的教士。读许地山的小说,我们会找到泰戈尔小说中女性人物的影子,他笔下的尚洁(《缀网劳蛛》)、惜官(《商人妇》)、阿葛利马(《商人妇》)、春桃(《春桃》)和敏明(《命命鸟》)等等一系列人物,几乎综合了佛陀般的慈悲和基督教的博爱,她们不受世俗之见约束,为着人类之爱而活着,使男性人物相形见绌。《缀网劳蛛》中的尚洁因救助受伤的小偷遭到丈夫的误解,她以苦行主义远走他乡,最终将丈夫从凶狠的世界中拯救出来。《商人妇》中惜官和林荫乔、阿葛利马和阿户耶简直就是相比照的女性世界和男性世界的代表,惜官与阿葛利马的宽容大量,林荫乔和阿户耶的背弃正义,两相对照,显示出女性救赎男性的道德意义。这些妇女形象大多具有一种人格的伟力,她们能够在困顿的生活中,牺牲自我,以救他人。尽管一些评论家有褒有贬,这些女性形象的意义始终没有枯竭,已经成为一种完美的精神形态,引起人们的爱意。

二、无妻性 泰戈尔笔下的女性遭遇各异,有准备要做妻子的,有做了童养媳的,有做了妻子不久就被休回的,有即将殉葬的,有死了丈夫仍居夫家的寡妇等等,这些女人共同的特点就是被剥夺了做妻子的权力。面对种种的冲突,她们既是妻子,又是宗教信徒,最后妻子的特性被掩盖。泰戈尔关注这种不平等的女性命运,并对童婚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典型的例子是《河边的石阶》和《笔记本》。在小说

[收稿日期]2003-06-03

[作者简介]张羽(1972-),女,吉林德惠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讲师,文学博士,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和台湾文学研究。

《河边的石阶》中,库苏姆的丈夫为了当苦行僧,将年幼的妻子休回家,十年后,夫妻相遇,苦行僧坚守了苦行主义,库苏姆只好自杀身亡,以求解脱。这决非普通的爱情悲剧,而是社会观念对生命的扼杀。《笔记本》中的小乌玛出阁嫁人时,还是一个喜欢在练习本上乱涂乱抹的女孩子,在夫家,遭到了众人的百般虐待。在当时的印度,女子到了成年还不出嫁,是辱没家门的,因而童婚成为一种普遍的陋俗。童婚首先造成了童女的无妻性,其次使很多童女刚长到青春妙龄就变成了寡妇,印度社会又反对女子寡后再嫁,这样,就剥夺了大多数女人做妻子的可能。冰心的《最后的安息》和这两部小说像是姊妹篇,童养媳翠儿是个善良、可爱的小姑娘,常常受到主人的虐待,最后悲惨而死,控诉了童养媳制度摧残弱小者的罪恶。冰心无力改变现实,但仍想给人以安慰,在结尾处,“灿烂的朝阳正照在她脸上,好像接她到极乐世界”,与库苏姆最后被慈爱的大自然伸手接进自己的怀抱,如出一辙,给悲剧人物以乐观的结局。在许地山的《商人妇》中,惜官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丈夫,发现他已另娶,她没有表现出作为妻子应有的抗争,这显示出她从来就没有把自己放置在妻子的位置上,来要求自己应该得到的权利。这些女性形象都处在被戕害的地位,但她们都是以平静的心态来完成自我道德的升华。

三、蛛网中的命运——重压下的行动哲学 传统印度价值观认为,女人生活的中心是家庭,泰戈尔直接逼近家庭中的女人,在最常态中,显示出女人的悲剧命运。与中国旧式小说里的妇女在受辱或景况不好的情况下,“左思右想,不如寻个短见,反觉干净”不同,泰戈尔塑造的女性形象信奉的是生本不乐和人间苦,越是景况不好,越显示出生命的韧性。小说《弃绝》中,当丈夫得知妻子隐瞒了自己的低贱种姓而愤怒地离家出走时,妻子并不感到惊奇,这种镇定自若更显示出在生活的重压之下的无奈。在《摩诃摩耶》、《素芭》、《还债》和《河边的台阶》等小说中,描绘了印度妇女的悲惨遭遇:有无人爱怜,在动物身上获得爱护和同情的哑女素芭,有为了满足丈夫的虚荣心而丧失视力的歌玛,有因为家里贫穷,不能出嫁的尼鲁帕码等等。她们都在生命的蛛网中默默地生存着。泰戈尔将原本悲惨的事情,放置在美好的人物身上,越发衬托出“悲”的意味来,展示了被残害的女性的牺牲精神。泰戈尔在文学中经常实践着痛苦即丰富这一命题,把痛苦看做是第一真实,告诫人们要从现实生活中解脱出来,以至产生崇高的精神美感,因而这些女性人物都成了脱离人生喧嚣的“快乐的人”。许地山的小说《缀网劳蛛》更多地受到泰戈尔的影响,尚洁是个充满着宗教精神的人物,被丈夫抛弃后,宗教使她在命运多蹇的情况下,更加勤勉。“我像蜘蛛,命运就是我底网。”形象地说明了生活在蛛网中的女性只能不停地补缀,以使不圆满的缺憾在行动中得以充实。

正是这些生活在蛛网命运下的女人,她们曾与男性一起创造了人类的文明,在男性统治的世界中,她们在处乱不惊中扮演着悲剧中的主人公,成为传统文化、宗法制度和男人的牺牲品,这是印度女性与中国女性一起奏出的悲音,她们的面孔是多元的,但精神实质却何其相似。我们比较泰戈尔与许地山、冰心笔下的女性人物的相似性和相异性,可以帮助我们分析中国和印度两国民族的心理状态,促使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深入展开。

Comparative Studies on the Female Horizons in Tagore, XU Dishan and Bing Xin

ZHANG Yu

(Taiwan Research Institut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certain similarities of the female figures' characteristics in the works of Tagore, Xu Dishan and Bing Xin: these females are under a heavy pressure of life, believe in "born-suffer is human" but strive against their fates. By compar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se figures, we can feel the mental states of Chinese and Indian the two nations, and promote further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wo countries.

Key words: goddess, slavey, wifelessness, philosophy of Action

(责任编辑:曹金钟)